

21 二十一世纪应用伦理学

中国官德

ZHONGGUOGUANDE



李建华 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应用伦理学

中国官德

ZHONGGUOGUANDE

李建华
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官德:从传统到现代/李建华著. —成都:四川
人民出版社, 2000. 6
ISBN 7-220-05035-6

I. 中... II. 李... III. 领导-道德修养-中国
IV. C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334 号

ZHONGGUOGUANDE

中国官德

李建华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唐正宇
周靖明
杨 潮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5 千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5035-6/B·220

定 价

15.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李建华，男，1959年7月生于湖南省桃江县，现为中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职博士。主要从事伦理学原理、道德心理学、法律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已出版《罪恶论——道德价值逆向研究》、《腐败论——权力之癌的“病理”解剖》、《教师伦理学》（主编）、《德性的心灵奥秘——道德心理学引论》（合著）、《体验心理学》（合译）、《道德的社会培育及其心理研究》（即出）等著作，发表论文70多篇，完成国家和省部级课题5项。

序 言

二十一世纪应用伦理学丛书序

我们正处在本世纪之末、一个新世纪、一个新的一千年的前夕。在这样新的历史地平线就要展现的时刻，展望伦理学的未来，我们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我们认为，作为 21 世纪哲学的一部分的伦理学，应当有所创新，才不愧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伦理学，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有自己的创新。不是资本主义的创新，更不是封建主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创新，以及乡愿式的或向各方面讨好的综合创新，而是真真实实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创新。20 世纪就要过去了，到了 21 世纪，我们不能不振作起来，我们既然有挤入世界强林的能力，也应该有独立自造适合祖国和现代社会的模式的本事。在物质上能做到，在精神上也一定能做到。但这不能不要求，要有敢于创新的志气。

至于如何建立新的伦理学，我们还是几句老话，21 世纪新伦理学，不管是以中国传统伦理名词为准，还是以西方伦理学名词为准，凡建立体系，都将以义（The Right, Justice）和仁

(Charity, Benevolence, Love) 为中心。但这两个基本概念或范畴, 在各时各地, 意义都有变化, 这点不能不注意。在孔子之前约一百多年, 时人就区分了“爱亲之谓仁”和“利国之谓仁”(《国语·晋语》献公九年), 后来儒学强调“孝悌也者, 其为仁之本”。但“孝悌”观念, 也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大氏族变为小氏族, 小氏族变为大家庭, 大家庭变为小家庭, 都影响仁的观念的变化。再加上经济中心从游牧变为农业, 由农业变为工业, 这更使伦理观念复杂化, 尽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理由或事实来说明变中有不变, 相对中有绝对, 多中有一, 但这种不变、绝对、一, 仍必须联系到变与多, 才有意义, 否则只是一堆抽象概念而已。伦理学, 决不能只在抽象概念上兜圈子, 它要改变时代、环境、生活, 但也要受时代、环境、生活的约束。我们也不反对用某一民族的道德传统上的名词来讲普遍的伦理学, 只要能讲出其共通意义就可以了。最怕的是, 自夸自己的伦理学理论及其概念, 认为其他民族的道德传统, 都不如我的丰富而又深刻。做学问所需要的是一种诚诚恳恳而又客观谨严地追求真理的态度。

21 世纪的新伦理学, 虽然仁与义都要讲, 但是, 首先, 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情爱、自我牺牲等)讲清楚, 而是要先把公正或义(或正义、公道)讲清楚。在此, 我们中国的青年学者, 已作出巨大的贡献, 到 21 世纪必将继续下去, 放出更大光彩。西方人崇拜耶稣基督, 因为他注重爱(Charity), 但西方人讲伦理道德, 从《圣经·旧约》、柏拉图, 直到今日美国的罗尔斯, 多半是以讲义(或称“重权利”)或公正开始的。或者以义为中心, 辅之以仁, 或以仁济义之缺失。这不是偶然的, 而是伦理学如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就应该遵循这种秩序或架构。爱而

不公正，比没有爱更为可怕，可恨！

要重权利 (Right)，重公正，就不能不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和意志，即人的主体或人格的价值。不是因为我们有爱别人的感情，便成为德行，而是因为我们善待他人，善于尊重人的人格（自我的人格与他人的人格）。道德或德行，也许是一个奇异的东西，你会尊重他人的人格及其价值，也会尊重自己的人格及其价值。换一个说法，你如果能真正尊重自己的人格及价值，你就会尊重别人的人格及价值。这就是正义或正义感的来源，也是道德的来源。讲伦理学就应该从这里开始，然后可从个人道德开展到社会道德，社会公正。另一方面，人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从客观的东西变为主观的东西，从实际的存在，变为理想的存在、合理的存在；实然与应然一致。

因此，爱与公正（或“义”），后者更重要。但是，我以为，义与仁，从几千年的中外伦理思想和经验来看，都是密切不可分的。可以分在前与在后，但不可分裂为对立或对抗。一个人能有正义感或公道观，他就必定同时有仁爱之心，休戚相关之心，否则他在人与人交往之间，不会有公德的念头。这在个人，就是爱人之心；在社会，就是互助互爱。换言之，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本来就一致。可是常常有人把道德看成是个人修养，道德即修身，乃是不充分的，也许是错误的。个人修养，离开社会道德，决不能成为道德。至多是宗教上的所谓“坐禅”之类，也许不会做坏事，但决不会做好事，做公正的事，做真正的道德行为。我们这样讲，不是说个人不需要修养，而是说个人修身，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去锻炼。个人的正义感、社会道德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必须真正先爱人，真正爱人民，别人或人民才会爱

你。你有正义感，人家见你受不平等的待遇，才能为你抱不平。古人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实际上，古往今来，那些品德高尚的人，以及为正义牺牲自己人，无一不是从社会中锻炼出来的。我希望有中国特色的未来伦理学，一定要从这类事实中去寻找道德规范和道德原理。应该记住，仁义是合一的，个人与社会是合一的，内心与外界也是合一的。道德、公正，是活的，不是一堆死概念，伦理学的发展的活的源泉是在现实生活之中。

因此，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纪的伦理学，不能只讲（不是不可讲）爱人之学，利他之学，这样讲，很容易把伦理学变成一番空谈，套话。它还应当成为社会公正之学，重正义感，培养社会正义，发展人类相互间的休戚相关情感，任何人都是道德的立法者，也是道德的实践者。总之，伦理学是一门注重实践的学问，实践本身是伦理学发展的生命所在，是伦理学发展的源头活水。有中国特色的新伦理学，一定要在改革开放的前提下，成为面向世界与未来的伦理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让我为我国的一些中青年学者的伦理学丛书写个序。感谢家乡出版社的厚爱，尽管我年事已高，仍欣然从命，把以上一些思考写上，权为序。

周 辅 成

序 一

许启贤

目前，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干部道德问题即官德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在此就这一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估且作为《中国官德》一书的序。

—

“官”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有了。但他的内容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在原始社会，氏族首领掌握着权力，官只不过是些保管主要档案的管理员。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官”字。西周时期，已形成了“文武百官”之说。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曾说：“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意思是说，国君死了，继承的君王三年不问政治，各部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

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政治概念。在剥削阶级社会中，是剥削阶级国家中担任一定职务或享有

一定特权的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对上，小官向大官直向全国最大的官——国君、皇帝负责；对下，统治人民。

在中国，历代比较有远见、对中国历史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皇帝或政治家、思想家，为了他们的利益和长治久安，为了防止官员腐败，一定意义上也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也极为重视“官德”问题。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周武王时，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即要求文武百官用箴言以诫武王过失。箴，就是规谏和告诫的意思。从历史材料看，唐以前官箴，主要是规谏君主皇帝；唐以后，官箴主要是针对文武百官。武则天认为文武百官也应该有一部指导自己言行的戒规即官德，于是组织人编写了《臣轨》一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同体（即君臣为一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五章，下卷则有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五章。武则天在该书序中说，编此书就是为了“发挥言行，熔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为臣下之准绳”。^①书成后，她自署其名，以示郑重。同时，她将此篇指定为贡举之士必学的材料之一。

宋、元时代，官箴有了一定的发展，吕本中、真德秀、张养浩等人，不仅是当时的名臣而且是循良之吏的典范。他们对官吏道德都十分重视，并结合自己为官的经验教训，写了一些官箴书，在内容要求上都较过去有很大的提高。比如宋代吕本中在《官箴》中开宗明义就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

^① 见徐梓编注：《官箴》，第1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以得下之援。”^①他提出的“清、慎、勤”三个字的为官之道，被后人称为“千古不可易”。后来的皇帝，有的还将此三字亲笔手书，赐给内外诸臣，以为勉励。又比如元代张养浩，曾先后任过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等要职。任职时曾著有《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等官箴，从正心修身、事上惠下、询访按行、审录推荐、用贤重民、远虑任怨等方方面面，规劝官吏要遵守官吏道德。他在《庙堂忠告》中的“修身第一”中说：“所谓善修自身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则令名随焉……”。^②当然，他忠告的都是些封建道德。陈琏为张养浩作的上述三种官箴即为《三事忠告》汇编作序时说：“为政之道，载在六经子史，昭如日星。”《三事忠告》类目虽然繁多，大要其实只有三个：“曰忠、曰敬、曰仁而已。”^③

明清时代，官箴书进一步成熟发展，而且数量俱增，内容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明代薛瑄，为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曾写《从政录》一篇，专论从政道德。清代郑端曾任康熙年间江苏巡抚，著有《政学录》等书。在《政学录》中对为官道德从各方面作了阐述；包括：初任事宜、日行规则、居官立政、四事箴、十害箴、戒石铭、事上接下等。清代石成金在他的《传家宝》第二集第八卷《谨身要法》中，对为官自修的十六个方面即：谨始、戒偏、立信、崇默、存仁、充量、习俭、力

① 见徐梓编注：《官箴》，第71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见徐梓编注：《官箴》，第17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转引彭忠德、李正容编著：《居官警语》第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

勤、寡交、远嫌、惩忿、守谦、勿炫、防骗、果断、保终等都作了详细规定。清代汪辉祖曾为乾隆年间进士，授湖南宁远知县，政声卓著。他在《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等官箴中，结合自己经验对为官道德作了较系统总结。在他看来，为官之道就在于：律己以立品为先，佐人以尽心为尚，而俭为立品之基，勤为尽心之实，等等。

中国历代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什么十分重视官吏道德？究其原因，首先，是和他们的阶级统治及阶级利益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十分漫长，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斗争十分激烈，每一个朝代都经过了兴衰起伏发展的过程。中华历史悠悠4000年，夏商两周、春秋战国、秦皇汉武、三国群雄、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明清列主，数百位帝王，改朝换代，频频发生。在漫长激烈斗争的发展过程中，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得出了一个共识，即官吏道德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尚书·说命》中说：“惟治乱在庶官。”即国家的治乱在于各级官员是否有德称职。“国家之败，由官邪也！”^①宋代哲学家陆九渊曾说：“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②相反，“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③其次，和官吏注重自己的名分有关。古人做官，相当一部分人想立功、立德、立言，扬名声，显父母。当然，也不乏有民众、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因此，他们为了在官场立足存

① 《左传·桓公二年》。

② 《陆九渊集》，第二十二卷。

③ 《孟子·离娄》上。

身，熟练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也需要从官箴中吸取经验教训，用官箴中规定的官吏道德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言行。

从上可见，中国古代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重视官吏道德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的。但是，由于他们受阶级的和历史的限制，由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局限，在他们的官箴中对官德的要求等，往往是瑕瑜共存，糟粕和精华混杂，既有严以律己、上进为民、强调为官责任的一面，同时，也有封建忠君、明哲保身、自私消极的一面。同时，他们把官吏道德看做是国家兴亡的根本，也夸大了道德、官吏道德的决定作用，具有道德决定论和英雄史观的倾向；但是，他们高度重视道德和官吏道德对国家安危兴衰、长治久安作用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各级领导及官员重视。

二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和国内，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和干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了，而是变成了人民的公仆。因此，古代官箴中提倡的一些官吏道德虽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干部的阶级性质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对干部的道德要求也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革命文献，对这个时期革命干部道德的实践进行了科学总结，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原则要求。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又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就是革命干部道德的核心内容。正是在这种革命精神和道德原则的鼓舞下，革命队伍中干部上下公正无私、坚持原则；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团结协作、顾全大局；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等。也正因为如此，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终于赢得了新中国的诞生。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接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对他们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作了这样的回答：“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③1980年12月25日他重申，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应该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有人以种种借口淡化或否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错误思潮时，他义正辞严地指出：“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④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更加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同上书，第1094～109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8页。

十分重视干部道德建设。1986年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在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都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首先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要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利用职权谋取私利”。1996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又进一步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越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越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为了提高各级干部道德水平，自1980年以来，党和政府颁布了许多决议和条例，引导干部认真实践干部道德。例如《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干部道德、行政伦理建设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上述这些《决议》、《规定》、《条例》中，都对干部道德（官德）的原则和规范提出了明确要求：忠于国家、秉公办事；不谋私利、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勤政尽责；执法守法、求真求实；各司其职、团结合作；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等等。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教育下，在各级干部自身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下，绝大多数干部都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守，勤政尽责，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因

此，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了广大人民的赞许。同时，涌现出了像焦裕禄、孔繁森、李国安等许多优秀领导干部，在他们身上闪耀着共产主义道德的光辉。

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加之一些腐朽的思想，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乘虚而入，侵蚀了党和政府的一些机体，致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有的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有的干部利用公款进口豪华小轿车和通信器材，供个人享用；有的干部挥霍公款，吃喝玩乐，经常出入豪华酒楼、宾馆和夜总会之类的高消费娱乐场所，一掷就是千金；有的干部利用公款营造超标准的住房；有的干部利用职权，违法乱纪，执法犯法，弄虚作假，要官、闹官、买官；有的干部甚至堕落到用公款赌博、嫖娼的地步，如此等等。干部这些不道德的腐败现象，不仅毁了干部，而且败坏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声誉，动摇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任。正如江泽民同志 1994 年 2 月 28 日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腐败现象已渗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尤其是侵蚀到我们的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些情况说明，如果我们不坚决打好反腐败这个硬仗，确实有亡党亡国的危险。”^①

^① 见《深入持久反腐败——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专辑》，第 2 页，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4 年 3 月。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正像中央很多文件和江泽民同志一些讲话中反复所说的那样，各级党委政府务必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搞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务必提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的自觉性，务必加强对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畏难却步，决不能松懈斗志。1997年1月29日，江泽民同志说：“对于领导干部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更应引起高度重视。对于组织、人事工作方面发现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骗官的歪风，必须坚决刹住。尽管这些不是普遍现象，只是个别的、少数的情况，但是这股歪风的危害很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同时，他强调，要搞好反腐败斗争，还必须“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同加强制度防范和管理监督结合起来”，同“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同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求共产党员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①

要搞好反腐败斗争，确实要标本兼治。思想道德修养，从一定意义上是治“本”的。德心不正，怎能正身、正人？《管子·修权》中说：“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意思是说，不能治理自身，怎能治理别人？官员道德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不仅要正自身，而且要用自身的道德人格去影响别人。自己若不端正，怎能去管理别人？所以，在当前加强干部道德建设，不仅对反腐败、

^① 《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中央纪委第11次全会上讲话的摘要》第2页、3页、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